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吴世昌全集/吴世昌著;吴令华编.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5

ISBN 7-5434-4672-3

I. 吴... II. ①吴... ②吴... III. ①吴世昌—全集
②《红楼梦》研究—文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28578号

书 名	吴世昌全集(全12册·14卷版)
作 者	吴世昌
责任编辑	潘海鸥
装帧设计	牛亚勋

出版发行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330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56.125
字 数	3565千字
版 次	2003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03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434-4672-3 1·770
定 价	57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自 传	1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前言	8
治学经验谈	14
释《书》《诗》之“诞”	16
《诗》三百篇“言”字新解	27
释《诗经》之“于”	43
释《诗经》之“於”	89
释《诗经》之“以”	104
《四部丛刊景宋本毛诗》校勘记	127
“舍我穉事而割正夏”	133
从“庄公寤生”说起	135
关于《易经》卦辞	138
卜辞旁注考	141
殷墟卜辞“多介父”考释	170
对《盂器铭考释》一文的几点意见 ——与郭沫若先生商榷	188
《说文》形义商兑	190
“即”“则”“祇”“只”“且”“就”古训今义通转考	211
“旅行”	266
论“H”在音韵学中之地位	268
跋顾颉刚著《墨子姓氏考》	273

自 传

一

一九〇八年十月五日,我生于浙江省海宁县硖石镇一个贫民家中。父亲是乡村油坊的伙计,我是六个孩子中最小的。八岁丧母,十岁丧父。小学没念完,无以为生,被亲戚送到杭州望仙桥直街立大参号当学徒三年,供膳宿,每月工资是二角小洋。学徒期满后当一年伙计,每月工资一元。一九二五年春季考入嘉兴秀州中学当“自助生”(即工读生),编入初中二年下学期。一九二七年读完高中一年后,以同等学力考入天津南开大学预科二年级。一九二八年秋季考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因第一年成绩较好,从第二年起获奖学金,每年三百元。一九三二年燕大毕业,授文学士学位,获得哈佛燕京学社国学研究所奖学金每年五百元。三年毕业,得硕士学位。时顾颉刚先生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所长,约我任编辑。同时,上海博物馆的董事长叶恭绰,馆长胡肇椿函聘我为上海博物馆特约研究员。一九三七年日军侵占北平后,据传日本宪兵队的黑名单上有我的名字,因我有过抗日活动。我化装商人逃出北平,转至大后方。

二

一九三八年,原在北平的师范大学、北平大学和天津的北洋大学迁校至大后方,成立西安临时大学,许寿裳先生和黎锦熙先生等任校务委员,二月初聘我去任国文系讲师,讲授李义山诗、宋词选、修辞学

等课。西安临时大学后迁至汉中城固县,改名西北联合大学。一九三九年国民党法西斯分子陈立夫改该校为西北大学,派文化特务张北海来校,压迫进步教授,许寿裳先生等被迫离校赴云南中山大学任教。一九三九年秋,中山大学来电聘我为国文系教授。我在该校讲授文字学、古代文法、要籍目录等课,把诗词课程让给冯沅君讲授。中山大学于一九四〇年夏迁回广东坪石。一九四二年国民党CC分子又在该校煽动风潮。我因拒绝与CC分子齐某合作,被解聘。改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半年后,任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一九四四年夏,重庆中央大学电聘我为国文系教授。日军在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进攻湘桂,交通阻塞。我让家属坐车先行,自己徒步到贵阳又到重庆,就任中央大学教授。在重庆时和地下党有联系,周恩来同志、王若飞同志曾邀赴茶话会,还参加过吴玉章、王维舟等同志的宴会。日寇在一九四五年投降后,我随中央大学的复员船于一九四六年迁返南京。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七日,得英国牛津大学电聘赴该校讲学,于一九四八年一月八日到英,任该校高级讲师兼导师,并由该校授予文学硕士学位。后又被举为该校东方学部委员。我在牛津大学用英语讲授中国文学史、中国散文史、中国诗、甲骨文等课,隔年轮流替换。并曾任牛津和剑桥两大学的博士学位考试委员。(回国后曾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博士学位的校外考试委员。)我到英国不久,内政部即派人到牛津大学和我谈话,劝我加入英国国籍。我婉言谢绝了。大学的同事又劝我买房子。因为英国房租很贵,买房子即可以用房租作为分期付款,还可以省缴一部分所得税。我因不拟常住国外,也没有采纳这些意见。一九六二年响应周恩来同志号召,回国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于国庆前率全家到京,即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现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一九七八年起,兼任本所学术委员,研究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聘为兼任教授。一九七九年国务院建立学位委员会,被任命为该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三

我在中学时即“不务正业”，没有用全部时间安心念书，却从事课外活动。一九二五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英租界巡捕枪杀工人、学生），我在初中二年级，利用“自助生”印讲义的方便，自写反帝传单，自刻自印，还组织一些同学到街头去宣传散发。因此，下一年全校选举时，我当选为学生爱国会会长。秀中的学校市市长（即学生会会长）和爱国会会长素来都是选高中二、三年级生担任，这次把初中三年级的徐荣道选为市长，吴世昌选为学生爱国会会长，还是秀中建校以来第一次。秀州中学是美国教会办的。一九二六年大革命时期，我和别的爱国学生宣传“收回教育权”，“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终于迫使美国校长劳立、窦维思夫妇“休假”回国，成立了由中国人自主的董事会主持校务，我被举为该会的学生董事。一九三一年发生“九一八”事变，日寇侵占东北各省，当时我在燕京大学，发起抗日运动，组织学生罢课游行，被举为燕大学生抗日会第一届主席，并主编抗日刊物《火把》。作为研究生的第一年，因忙于抗日活动，没有按时交研究成绩。从第二年起就被取消了奖学金。以后即靠稿费过活，也因此迫使我多写一些文章。

四

我在中学时即开始写作，曾在学校的文艺刊物《碧漾》上发表过一首数十页的长诗，这是受了郭沫若一些诗集的影响。在南开大学时也发表过诗作。一九二八年秋曾在《天津商报》发表短篇小说《进财》，写一个小城市的贫民家庭的悲惨结局，取材于我幼时邻居的家庭情况。在燕大时用英文写过一个讽刺独幕剧《一封情书》（一九三〇年，未发表）。以后在天津《大公报·文艺》（沈从文编）、《武汉日报·现代文艺》等刊物上也陆续发表过一些散文。但我发现自己不适宜于文艺创作，主要兴趣转到考证研究方面去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

文《释〈书〉〈诗〉之“诞”》发表于《燕京学报》第八期(一九三〇年,这是该刊第一次发表本科学生的论文),立即被译成德文,后来又译成俄文。接着又发表《〈诗〉三百篇“言”字新解》、《释〈诗经〉之“于”》等文,总题为《〈诗经〉语词研究》。苏联汉学家奥香宁研究汉语虚词的博士论文,即用我所发表于《燕京学报》的材料和论证(这是一九六〇年我在莫斯科开会时他自己告知我的)。同时,我在《新月》月刊上发表《辛弃疾》(传记,连载于三卷八、九期,一九三〇年),在《文学季刊》发表《诗与语音》(创刊号,一九三三年),在《学文》发表《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九三四年,有两个英译本。《学文》是林徽音所发起,闻一多、余上沅等主编,我也是负责人之一)。其他刊物如天津《大公报》的《史地周刊》、《图书副刊》、《文艺》、《文艺星期特刊》、《北平晨报》的《北晨学园》、《艺圃》,天津《益世报》的《读书周刊》,《武汉日报》的《现代文艺》,南京《图书评论》、《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左恭主编),北平的《独立评论》,上海《书人月刊》、《申报·星期论坛》、《论语》等刊物,都或多或少发表过我的文章。《文艺》上发表的一些散文和《学园》上连载的游记(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三日至十二月十三日),曾收集为《散文甲稿》(一九三六年,北平立达书局出版)。在北平研究院时,曾建议并设计了史学研究所的《史学集刊》,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密宗塑像说略》(一九三六年第一期)、《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第三期)等文。同时和燕大同学、地下党员杨刚、连士升等合编宣传抗日的通俗刊物《大众知识》半月刊(此刊名义上是顾颉刚主编),并为此刊经常撰文,直到一九三七年该刊被迫停刊。

以上是抗日战争以前的学术活动和作品。

五

日本汉学家桥川时雄在一九三六年编著,次年在东京发行的《中国文化界人物总鉴》,为先兄(其昌)和我分别立传。在“吴世昌”条下说:“吴氏就学期间以来,尝试多方面的著述,文、史无所不通”。(此书出版时我在大后方,根本不知,一九六二年我自英回国后才由友人

见告,并把先兄和我的条文代为译出。)

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大后方教书。大部分时间用在编讲义(教材),发表的文章比较少。即使有,也是鼓吹抗日、激动人心的宣传文字。战后,一九四七年罗根泽编南京《中央日报》的副刊《文史周刊》,向我组稿,我在该刊分期发表《论读词》四个长篇。本想写成一部《词学导论》,因出国中止。其他报刊如重庆的《新华日报》、《客观》、《时事新报》,上海的《大公报》、《时事新报》、《观察》、《人物杂志》,苏州的《文讯》(顾颉刚、白寿彝编),南京的《学识》(吴斐丹编),也在不同时期或多或少发表或转载过我的一些诗文。我在一九四八年初出国赴英以后,上海观察社收集我在各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编成《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一书,包括十二篇有关文化、教育、学术的论文(一九四八年,《观察丛书》第五种)。

六

我在国外用英文写作,曾在各种英文刊物上发表若干论文。学术性的刊物如《东方艺术》、《科学进程》、《牛津杂志》(本大学教职员的同人刊物)、荷兰和法国的联合版《通报》、印度的《雅利安道路》、法国的《汉学要籍纲目》,以及《大英百科全书》、《每人丛书百科全书》等书刊都发表过我的文章。比较重要的有研究甲骨文的《卜辞旁注考》,发表于法国——荷兰联合版的欧洲最老的汉学权威刊物《通报》(第四十三卷,一~二期),还为《每人百科全书》写了有关中国的条文二百多条,包括我国领导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和鲁迅的传记、最长的条文达三万多字。又为《汉学要籍纲目》写短篇的提要四十六条(一~四期)。一九六一年二月,英国牛津大学出版了我的《红楼梦探源》英文本。我有时也在英国的报刊如《新政治家与国家》、《孟彻斯导报》、伦敦《泰晤士报》发表文章,驳斥反华的言论。

在国外时,我曾应邀出席过在英国、法国、意大利、苏联举行的一些国际学术会议,宣读了学术论文。我在一九四八年一到英国,即被选为设在伦敦的“大学中国委员会”的委员,后来又当选为该会的执

行委员,直到一九六二年离英回国。

在我回国以前,北京的《考古通讯》、《新华月报》、《光明日报·东风》、《文学遗产》、《文学遗产增刊》、上海《文汇报》曾发表或转载我的有关考古和《红楼梦》研究的文章和诗。回国以后,曾在下列各报刊发表过文章:《新建设》、《中国文学》(英文和法文版)、《图书馆》季刊、《中华文史论丛》、《文史》、《诗刊》、《文物》、《侨务报》、《文学评论》、《上海文学》、上海《解放日报》、《天津晚报》;各大专院校的学报:如郑州大学、南京师范学院、徐州师范学院、哈尔滨师范学院、沈阳师范学院;其他刊物如《社会科学战线》、《红楼梦研究集刊》、《红楼梦学刊》;海外刊物如新加坡《南洋商报》,日本《东京支那学报》,香港《大公报》、《文艺世纪》、《文汇报》、《七十年代》月刊、《广角镜》、《中报月刊》都刊载过我的文章或诗作。香港商务印书馆早在一九六三年一月出版了我的诗词集子《罗音室诗词存稿》,大部分是我三十年代的少作。我早年的旧诗出入唐、宋,率意信笔,不拘一家。词则取径二晏以入清真、稼轩,独不喜梦窗、玉田。是年香港建文书局用我的姓名出版《散论红楼梦》一书,其中多收入别人的文章。我所写有关《红楼梦》的专著论文约四十万字,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为《红楼梦探源外编》,一九八〇年出版。除了《红楼梦》方面的论文外,我还写了些有关文学史和考古学的论文。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和哲学研究所的温锡增先生合作,在业余时间为世界历史研究所翻译了《菲律宾共和国——历史、政府与文明》一书。并根据中国方面的史料,加以详细的订正和注释。北京商务印书馆于一九七九年出版(因“四人帮”爪牙的阻扰,成书四年多以后才能付印)。我又为外文出版局的《红楼梦》英译本第一、二卷(前八十回)作了逐字逐句的审校工作。

七

我在一九六四年被选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参加第四届会议。一九七八年又被选为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委员,

列在无党派爱国人士组。一九八三年五月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六届会议浙江省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委员,全国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七九年我参加中国作家协会,当选为作协代表。一九七九年十月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期间,我被举为主席团成员,当选为中国文联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一九八〇年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赴英访问(四月~五月)。一九八二年九~十月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古典文学专家代表团赴日本讲学和参观。次年八月又赴日本参加第三十一届亚洲北非社会人文科学国际会议,并在京都大学讲中国文学。

原载《中国现代作家传略》[上],四川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第七节略加补充。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前言

有一次，唐弢同志和我同车去听一个报告。在路上因为谈到鲁迅的旧诗，他忽然对我说：“你们是书香门第出身，所以你和令兄从小就会做诗词歌赋。”我听了不禁笑道：从我懂事的年龄回忆起来，我家里惟一的书是挂在灶墙上的“时宪书”，俗呼“历本”。但我们的邻居有的穷得连“历本”都买不起，有事要挑一个好日子，便来向我母亲借“历本”。我母亲也不认得几个字，她只看某一天条下印着密密麻麻许多字，那就是“宜祭祀、裁衣、沐浴、理发、合婚、下葬……等等”一大串吉利话，肯定是好日子。如果某一天条下干干净净只有四个字，那一定是坏日子：因为这四个字是“诸事不宜”。

我们家里读书的风气是我的四哥搞起来的。他十来岁就看完了《三国志演义》。小学毕业以后，他不肯像别人家的孩子那样去学生意。有一次，他从“敬惜字纸”的一米多高的大废纸篓中捡到半部《传习录》，大好之，看得寝食俱忘。后来又弄到一本上海缩印的《经义述闻》，他又如饥如渴地把它看完了。不久父亲去世，族中一位伯父推荐他这十六岁的孩子到杭州一富商家中教更小的孩子。比他小四岁的我则被送到杭州当学徒工。但他鼓励我不要放弃读书，他以后会想法子让我进学校。他寄给我半部扫叶山房石印的《文选》，我在铺子里读完，疑难部分只看注而无师承，当然只是似懂非懂。但因有了这点基础，我后来在中学和大学中也占许多便宜。

我在小学时即常常要纪念“国耻”。每年五月九日，小学生便由老师领着，整队上街，手里拿着五色纸糊成的三角形小旗，上面写着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枪毙卖国贼!”和“抵制日货”、“还我河山”等标语。在中学时代一九二五年又有“五卅”纪念,近在上海的日本工厂杀害工人,学生游行示威抗议,英国巡捕又枪杀学生十六人。次年又有远在北京的“三一八”惨案,军阀段祺瑞的军队枪杀请愿学生二十余人。一九二八年五月三日,国民革命军北伐将抵济南以前,日军自胶州湾攻占济南,杀伤我军民数千人。作为一个中国的知识青年,在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在短短的四五年中,遭逢着这样连续不断的可悲、可痛、可恨、可耻的国家大事,怎么能够静下心来读什么书!更何况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多少青年被叛徒出卖牺牲,更何况紧接着国民党中各派的军阀频年内战以后,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乘机吞噬东北四省,而南京的蒋介石政府竟下令我军不许抵抗。生在这样一个时代的中国青年,如果不是醉生梦死而还有点志气,他既要面对这些无可奈何而又无可回避的历史局面,又要准备自己,为将来建设这个祖国的文化,为恢复这个祖国的荣誉,为这一百年来受尽屈辱的四万万同胞重新树立信心,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而像我这样生于贫寒之家,幼失父母之教;又复失学多年,入学后只能半工半读;则在我学龄期间所能吸取的精神营养之贫乏寡薄,可想而知。比起唐弢先生所谓“书香门第”的子弟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至于进入大学以后,理应潜心向学,努力求知。但当时的国事螭蟾,既如上述,则在每个青年只有两条路可供选择:或则埋头读书,不问外事;或则跑出书房,从事革命。而我则恰恰在这两者的夹缝之间讨生活,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我的精神生活像一个钟摆,左右摆动:一会儿坐下来读一点书,写一点东西;一会儿又被祖国危急的呼唤所惊起,不能不去参与救国的活动,以至不但荒废了学业,连每年五百元的奖学金都丢了。但也因此而逼得我不能不鬻稿为生,多写些文章。作为一个研究生而把大部分时间花在抗日活动上,几乎使我连硕士学位也丢掉。但我也并不后悔。当然,如果我不荒废学业,我后来在学术方面的成就会好些。我的有些知友因此为我可惜,而我自己则以为生为中国人,把时光用在抗日工作上应该是:既不后悔,也不惋惜。

我虽在中学时代即已发表作品,但认真写出够当时学术水平的文章,则是在燕京大学二年级英文系求学时。该系老师大多是美国人,教书虽然认真,老实说,没有多少学问,讲不出什么道理来;因此我抽出时间到国文系听课,有时也到邻校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听吕恰慈(I. A. Richards)、吴宓、叶公超诸位教授的课。因为无家可归,寒暑假就仍住在校中。好在图书馆照常开门,而假期中阅书的人少,我就整天在里面,把需要的参考书铺开,有时占用两三张桌子也不碍事。大阅览室好像是我个人的书房。我那一篇《辛弃疾》传记(本卷未收)就是一九二九年暑假在燕大图书馆写成的。

我自弱冠弄翰,至于皓首,五十年间,大约写了二三百篇文章,其中纯粹学术性的论文约二百篇,却从未结集。近年以来,常有人问起我的著作目录,有的刊物或辞典的编者,社会团体或机关的档案、资料部门,也常寄来表格,要我填写或开列著作目录,使我不胜其烦。真欲“临表涕泣,不知所云”。不得已,我在前几年收集了过去发表的文章题目,以及刊载我文的刊物名称,编成两个目录:一为我的中英文著述目录,一九三〇至一九八〇年。一为刊载过我的文章的国内外报刊目录,一九二六至一九八〇年。前者列举可以查考的论文及其他著作二百余篇,包括英文著作六十余篇;后者列举国内外中英文刊物一百余种。以备需要者索取,而省我抄缮之劳。除了专书如《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英文本《红楼梦探源》、《罗音室诗词存稿》、《红楼梦探源外编》等四书已在国内外先后刊行外,两个目录所列举的学术论文则从未编集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施议对同志见此目录后,一则见我年事已高,再则深恐拙著日久散失堪虞,屡次敦促我编成文集,以广流传,因按文体性质,暂拟辑为四卷:

第一卷 文史杂著(包括考古学及其他论文);

第二卷 词学论丛(包括诗话);

第三卷 序跋之属(包括书评);

第四卷 时论杂文(包括其他文艺作品)。

此第一卷,所涉较广,时距的跨度也较大。以写作时间而论,第

一篇《释〈书〉〈诗〉之“诞”》写于一九三〇年,有关《礼记·檀弓》篇一文写于一九八二年,二文相距过半个世纪。就诸文的内容而论,包括古代经籍的训诂发明,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古代社会风俗的研究,古今文学的比较研究,古典诗歌、乐府中的问题,敦煌学中有关资料的考释,宗教学中的问题,旧中国丧失文物的调查报告。最后附录一篇从中国古典文献中发掘出来的有关生物学中“条件反射”的问题。这一卷论文的主题范围如此广泛而不同,真可谓之“杂家”,但还有一些论诗谈词以及文学批评之文,将编在以下二卷中,因为这一卷已经有三十多万字了。

我在《燕京学报》共发表四篇论文,最长的一篇约三万字,刊于第十四期,考定六个语词的“古训今义”。因太长也太枯燥,此卷没有收存。研究训诂学的专家如欲参考,可找原刊。这一组所收三篇之中第一篇写作时间最早(一九三〇年),也最引人注意。钱穆以为这是吴其昌的论文。及至看完了,见文末记有“燕大图书馆”字样,正奇怪他为什么不在清华图书馆而到燕大来写作,再看文题作者,才看清楚是谁所作。彼时钱穆是燕大国文系讲师,他知道我是英文系的二年级学生,所以决不会写这样的考据文章。后来《燕京学报》登载本刊的广告,也把第八期此文的作者误为“吴其昌”。直至解放以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刘修业君编《史学论文索引》,仍把此文的作者归于“吴其昌”。虽经谢友兰同志告诉她错了,也没有改正。刘君还是当时燕京大学国文专修科的毕业生呢。

还有一点也可以附带一说。当时国民党在文化方面的政策越来越反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竟公然下令湖南省所有中学要“读经”,没有人敢反对。胡适虽然是个资产阶级的学者,但他毕竟参加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有点现代知识;在这方面胡适还是比何键高明些。针对何键,他发表了一篇《我们还不配读经》^①。他先引王国维

^① 他此文先登在他编的《独立评论》,后来收入《胡适论学近著》、《胡适文存》第四集。

致友人信,承认经书中许多字句还不懂得,下文又引当代研究古代经书有成绩的三人:杨树达、丁声树^①、吴世昌。他介绍吴世昌的研究成果说:

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作“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作“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厥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置之陋巷”、“诞置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

——《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册第五四六页

《诗与语音》也是五十年前的旧作。这一篇虽是被郑振铎先生逼出来的急就章,而其中所探索的却是当时诗坛上的一个新课题,这本来是个大可发展的主题,但我自己没有继续研究下去,别人也没有接力跑上来。直到六十年代,香港有人翻印此文,前几年,香港中文大学的叶维廉教授来京访问,谈起他的研究工作,说是最先因受我此文的启发而从事此项研究。在此之前,原北京大学英籍教授燕浦生(William Empson),在五十年代初回国后,任歇菲尔大学英文教授,曾有《莎士比亚与语音》一书问世。

《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九三四年发表于林徽音女士、闻一多、叶公超等教授创办的《学文》月刊。燕京大学美籍教授包贵思(M. Grace Boynton)当时也在研究中国园林,曾去函该刊编者闻一多,请求允许她将此文译成英文。后来她在作者的帮助下译出一个节本,刊在上海的英文刊物《中国艺术与科学学报》(China Journal of Art and Science)一九三五年七月号。此文后来又有美国韦尔斯莱大学的教授宴维丝小姐的一个节译本,一九六〇年英国牛津大学德效赛

^① 他举杨树达对于《诗经》中“于以”一词的解说。参看本卷《释〈诗经〉之“于以”》一文有关章节。关于丁声树,他举丁氏《释否定词“不”“弗”》一文。

(Homer H. Duds)教授的英译本则是全文。

在三十年代,“敦煌学”正是和“甲骨学”一样渐渐成为“当世之显学”。但因资料深藏国民党政府的“中秘”,流传不广,所以研究者不多。我写《敦煌卷〈季布骂阵词文〉考释》,只求把已经流传的材料(即刘复和罗振玉印行的书)复其原状,通其文义。以后敦煌材料的陆续刊布,当然后来居上。然而“椎轮为大辂之始”,拙文正是当时许多椎轮之一。在我治学的过程中,此文也标志着敦煌学的一个初步阶段。最近周绍良同志印行《敦煌变文论文录》,也收此文,用的即是《史学集刊》文本^①。我事前不知,以致许多讹字错解未及改正。此卷所收则是改正本,可以正周本之误。

由于敦煌的珍贵文物被帝国主义的御用文人大肆掠夺,自然令人想到近百年来中国其他文物之被掠夺与损坏。一九三四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把故宫及别处的历史文物运到伦敦去展览。事先盛传古物出洋名为展览,实际上将出售英国,以换军火。当时北平的文化界发起反对古物出洋,由各大学的知名教授领衔,连名打电报给南京政府表示反对。我也被邀参加这个“运动”,被分配到的是宣传工作:即在报刊撰文,痛陈过去五十年(从一九三四年上推)中国历史文物之丧失,以唤起各界人士对于古物的爱护珍惜。本卷所收《近五十年中国历史文物之丧失》以及其下二文,乃是我调查了各大图书馆所藏外国出版的中国古物图录等书而提要写成的。因为太长,分成三篇,在天津《大公报》的《史地周刊》上分期发表。等到文章刊出时,古物早已出洋,但因此而引起国人对于文物的重视与爱护,则此三文虽已成为“明日黄花”,也未始没有唤起读者的爱国思想。

本卷的编集、缮写由施议对同志主持,参加缮写工作者为董乃斌、刘扬忠、陶文鹏、黏凤婷诸同志,盛情可感,谨此鸣谢。

一九八三年二月十七日记于北京 吴世昌

^① 按拙文载《史学集刊》一九三七年第三期,周书误作“一九三九年”。按日军于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侵占北平,北平研究院即停止工作。史学研究所人员一部分迁至西安,一部分迁昆明。参看《敦煌变文论文集》下册,页五五五。

治学经验谈

一、请您谈谈自己在治学上的师承关系；您生平最得力于哪几位老师或朋友？

答：我自小失学，父母双亡，无师承。中学是美国教会办的，英文、数学还好，中文不行。先兄（吴其昌）好学，但因谋生，兄弟常不在一处，我无从受益。自小爱读《文选》与《楚辞》，不喜小说（尤不喜《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书），认为迷信，不可信。在中学时（一九二五～一九二八）好作古文。在大学进英文系攻读英文。

二、您开始治学最得力于哪几本书，给予您哪些影响？

答：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使我读古书必求甚解，一个字也不放过。梁启超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国历史研究法》与顾颉刚的《古史辨》，使我对每一古书必先辨其真伪，再将有关年代列表，用公历标出，放在桌上或挂在墙上；对每一史事必查究年代，以定真伪、是非。如胡适所谓“庚辰本”《石头记》，“庚辰”是一七六〇年，而此书中有丁亥脂评，丁亥是一七六七年，故知“庚辰本”之名是错误的。有人坚持“庚辰本”之名，大谬！

三、您是怎样搜集、积累资料的？您怎样积累、使用卡片？

答：当然用卡片，并要归类，如“训诂”、“唐诗”、“宋词”等。更细者如“科技史料”、“古人食蛇”、“独木桥体”、“宋人词用唐诗”、“宋人词用唐传奇故事”、“宋人食茶加盐姜”等等，随时随手记录。看书时要有善于分类的头脑，例如见《世说新语》中曹操“望梅止渴”的故事，须知这是“条件反射”的证例。手要勤，随时写卡片。资料必须注明

出处、卷页。

四、您在什么时候、什么刊物上发表第一篇学术著作？在什么问题 上有所突破或创新？

答：我在一九三〇年《燕京学报》第八期发表《释〈书〉〈诗〉之“诞”》一文。这个“诞”字，二千多年来多误解为“大也”、“虚妄也”，如《书经》“诞无我责”，《诗经》“诞弥厥月”、“诞置之平林”都讲不通。王引之《经传释词》则认为它是“发语词，无义”，也甚不准确。我的研究结果是释为“当”字，一声之转，意义即通。胡适在《我们还不配读经》一文中举四个研究经书有成绩的学者：王国维、杨树达、吴世昌、丁声树，提及拙文，认为解二千年未解的意义（见一九三六年《胡适论学近著》）。一九六〇年八月，我到莫斯科参加第二十三届国际东方学者会议，遇见《中俄大学典》主编奥香宁，他说他的博士论文研究中国古代汉语，主要是根据我发表于《燕京学报》的一系列有关论文的。

五、您在治学上有哪些经验？您认为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有哪些问题应特别注意？

答：不论看什么书，必须有自己的见解，不迷信书中所说。对于古人、今人都不可全信，但同时又必须虚心学习古今之长，不自以为是。如明知旧说错了也不改，则永无进步。古人可能错，今人（包括老师、权威、名流）也可能错，自己也可能错。总之，对一个问题要反复考虑，不得到满意合理的答案，决不停止研究。引用古书或他人著作，必须加引号注明来源，不可占为自己的“发明”。别人著作引他书，必须查对原书，有无错误、增删或歪曲。要严防剽窃。学术界有扒手，也有流氓小偷。要注意，要无情揭露，不可姑息。真理高于一切。

原载《群众论丛》一九八一年第四期。这五个问题系杂志编者所提